卢沟桥事变报道第一人：用生命记录抗战的战地记者

本报记者王京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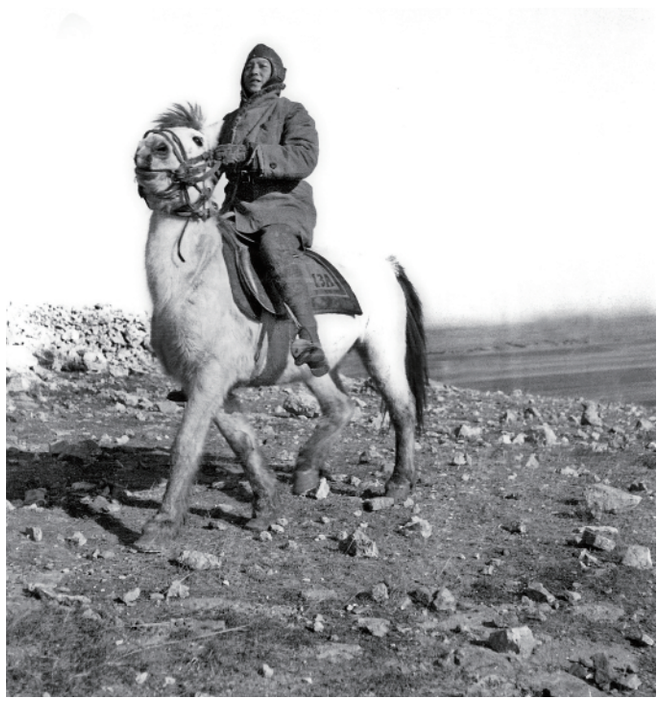
1937年7月10日，清晨的北平城里，一个背着相机、身材高大的青年，走出家门，跨上自行车，一路疾行。

他从北平只身穿越炮火，来到卢沟桥一带，被日军截住，“他们先疑我为中国军的高等侦探，理由是新闻记者没有勇气到日军方面来，然而由于我的态度自若，这个猜疑也就消除了”。一小时后，他有惊无险地通过盘查，成为卢沟桥事变后首个抵临现场的新闻记者。

在这天之后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这名青年将成为中国近代新闻史上，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物。

他是方大曾，笔名小方。

他说：“方者，刚正不阿也，小则含有谦逊之意，正是为人处世之道，我就是要做一个正直的、于国于民有用的人。”



左图：绥远前线（选自冯雪松著《珍藏方大曾》，新世界出版社）。右图：方大曾在绥远前线（选自冯雪松著《珍藏方大曾》，新世界出版社）。

“永远都在旅途中”

“时到如今，我们的民族再也不需要那温柔幽雅的陶醉，而该有魁伟豪迈的姿态了！江南的朋友们，你们都到这里来吧，不只是这里的风景好，而且是因为这里的疆土需要我们的保卫啊！”

——方大曾《从大同到绥远》，1936年

1912年，方大曾生于北京一个殷实之家。读小学时，母亲用7块大洋给他买了架相机，从此，相机成了他形影不离、患难与共的伙伴。

踏访卢沟桥前线，并不是方大曾第一次单枪匹马奔赴战场。妹妹方澄敏曾在文章中回忆，九一八事变后，哥哥就天天都在东奔西跑，永远都在旅途中，“他总是带着一把雨伞、一条毛毯、一个背包、一架照相机就离开家了”。

1936年11月，绥远抗战爆发，这是卢沟桥事变前，中日之间的一次大规模局部战争，中国军队先后取得红格尔图战役和百灵庙战役大捷，举国振奋。12月4日，方大曾只身登上火车，由北平赶往绥远前线，开始了长达43天的采访。

此时，他刚从中法大学经济系毕业满一年，在和友人一起成立的“中外新闻学社”担任摄影记者。

在后来的报道中，方大曾写道：“为了把绥远抗战的情形，可给读者一个实际的真确的认识，所以记者乃有前线之行……听到车窗外面咆哮的大风，就觉到冷栗，而体会到战壕中守卫国土的将士之身境。啊，冷！冻得死人的冷！”

零下30多摄氏度的塞外寒冬中，方大曾搭车、骑马、徒步，日夜兼程。他拍摄了数百张照片，写成《绥东前线视察记》等多篇战地通讯，记录下士兵们挖战壕、擦机枪等备战场景，和军官们对抗战的思考与热诚。

期间，方大曾遇到同在前线采访的著名记者范长江，并告诉对方，自己马上就要骑马前往刚发生过战争的百灵庙。

他准备斜穿阴山，经百灵庙等处，再横穿一段草原，考察沿途所经地带被伪匪蹂躏后的境况。这段路程十分凶险，自战争平定后，还没有一个记者去过。

“那是雄壮而艰苦的旅程，这位平时没有被人重视的朋友，今天却来这样一个壮举。”这个“硕壮身躯、面庞红润，头发带黄的斯拉夫型青年”因此给范长江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文章中感叹：“青年人的脑海中，只有光明与胜利的追求。所谓危险和艰难，我们容不得多加考虑，惊人的事业，总成功于常人不敢为之中。”

方大曾的确是不惧艰险的。今天，人们能从方大曾留下的自拍照中看到多张他攀登在高处的形象——在塔吊上、天梯上、山顶上，这个年轻人似乎总想站到更高的地方。

这种被母亲评价为“爱冒险”的性格，伴随思想的成熟与时局的牵引，使方大曾注定走在时代前列，而留给人们一个远行的背影。

在绥远前线，方大曾寄给母亲一张自己身着戎装、头戴钢盔的照片。上面写着：“母亲大人存念　男小方摄于1936年冬时执行摄影工作　于绥东战地”。

方澄敏觉得：“这就表示，从那时起他就要出去了，不定在哪，他早已立志献身于自己喜欢的事业，而不管是天涯海角了。”

赴火线，用生命记录抗战

“我看到一大批伤兵结队缓缓地走着。他们经过军队哨岗时，哨兵们严肃地举枪敬礼，记者被感动得落泪了，尤其是夜色朦胧中，给这一幅画面增加了百倍的伟大。”

——方大曾《保定以南》，1937年

在卢沟桥前线，方大曾采访了奋勇杀敌的二十九军将士，拍下身背大刀、步枪，守卫在卢沟桥石狮旁的中国军人英姿。

返回北平城后，他写成长篇通讯《卢沟桥抗战记》，洗印了照片，在一连数日的忙碌中，度过了自己的25岁生日。

1937年8月1日，上海《世界知识》杂志第6卷第10号上发表了署名“小方”的《卢沟桥抗战记》及数张照片。之后，《良友》杂志、英国《伦敦新闻画报》等国内外媒体陆续刊发了他有关卢沟桥事变的专题摄影报道。

这些由记者亲历现场记录下来的文字与图片，在第一时间，向世人提供了中国全面抗战发端的一手信息，成为中华民族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献。

“我站在卢沟桥上浏览过一幅开朗的美景，令人眷恋，北面正浮起一片辽阔的白云，衬托着永定河岸的原野。伟大的卢沟桥也许将成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的发祥地了！”

这是方大曾在《卢沟桥抗战记》中作出的预言，这一预言很快成为现实，而方大曾的命运也被这场战争改写。

卢沟桥事变后，日军不断增兵华北，对平津进行军事包围，大规模战事一触即发。方大曾寄出《卢沟桥抗战记》和照片不久，就收拾行装，又一次离家，奔赴前线。

当时，中国方面的增援兵力在石家庄、保定一带集中，方大曾便也来到这一带采访。他再次碰到范长江，还结识了上海《新闻报》记者陆诒和北平《实报》记者宋致泉。1937年7月28日，他们结伴从保定出发，北上长辛店。

“车抵良乡车站，距长辛店还有25里，前线炮声已隐约可闻，小方从座位上跳起来对我说：‘听，老陆！这是中华民族争取解放的炮声。’他坐不住了，隔了几分钟，又把我拖到车窗旁边，手指青纱帐起的原野说：‘你看，我们的军队正在向前线开拔！’”

几十年后，记者陆诒依然记得小方那张“年少、英俊、朝气蓬勃”的面容，记得他头戴白色帆布帽，身着白衬衣、黄短裤，挎着相机，足蹬跑鞋，精力充沛在前线奔走采访的身影。

从长辛店下车后，方大曾告别同伴，独自沿铁路徒步，他笑嘻嘻地说要去拍铁甲军在前线参战的镜头。

两小时后，他从前线回来，跟陆诒说，自己刚给一个二十九军青年战士照了相，这位战士只有16岁，高个儿、大眼睛、脸色红润，手里拿着缴获的日本军官指挥刀和望远镜。说话间，一颗炸弹在附近爆炸，“小方不屑一顾地说：‘今天收获不小！’”

1937年7月29日，北平沦陷，方大曾有家难回，经范长江介绍，开始担任上海《大公报》的战地特派员。

此后，他奔走于长辛店、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等地，冒着枪林弹雨，一次次深入战场，几乎哪里有战斗，哪里就有他的身影。

1937年8月初，南口战役打响，日军发起对南口、居庸关的总攻，中国守军拼死支撑，与敌人展开激烈肉搏，阵地得失几度反复。

方大曾就在这时，只身出现在南口战场最前沿。在通讯《血战居庸关》中，他记录了中国守军肉搏日军坦克的悲壮。

“第七连连长带着两排人跳出阵地冲向坦克车去，他们冲到这‘铁怪’的眼前……不顾一切地攀上前去，把手榴弹往窗口里丢，用手枪伸进去打，以血肉和钢铁搏斗，铁怪不支了，居然败走……两排勇敢的健儿虽然死了一半，但我们终于获得胜利。”

他也记录了战斗之惨烈与中国军人斗志之高昂。

“十三军的将士们真了不得，他们奉到的命令就是死守阵地，但是这里何来阵地？一些临时工事亦被炮火轰平，居庸关从今以后再也不会看到它的模样了，有的只是由我们忠勇的抗日将士的血肉所筑成的一座新的长城！”

战局动荡，8月下旬，方大曾前往大同与范长江等商定下一步工作方向，赶上日军进攻大同，他转移至石家庄。之后，听说增援南口的卫立煌所部三师正与日军激战于永定河上游，方大曾带上充足的蓝墨水、稿纸和照相器材，急急登上北去保定的列车。

临别时，范长江说：“希望你能写一篇‘永定河上游的战争’！”方大曾平和坚定地回答：“我一定有很好的成绩答复你。”

此时，“战地特派员小方”已经是报道抗战的著名记者了，并且，像他这样摄影与文字都出类拔萃的全能记者，当时几乎绝无仅有。没人料到，这颗横空出世的耀眼新星，竟会一闪而逝，不知所终。

1937年9月，因保定战况吃紧，方大曾退到距离保定东南约50公里的蠡县，18日，他从这里向上海《大公报》寄出通讯《平汉线北段的变化》，又给在邯郸的亲戚去了封信，说：“我仍将由蠡县继续北上，达到（范）长江原来给我的任务。”

1937年9月30日，《平汉线北段的变化》在《大公报》上发表。自此，人们再也没收到方大曾的只言片语，也再没有人见过他，这个身挎相机在平汉路前线不断突击的年轻身影，就这样消逝在硝烟炮火中。

“时代的遗嘱”

“方大曾的作品像是三十年代留下的一份遗嘱，一份留给以后所有时代的遗嘱……当一切都消失之后，方大曾的作品告诉我们，有一点始终不会消失，这就是人的神色和身影，它们正在世代相传。”

——余华《消失的意义》，1999年

在上海和汉口，范长江遇到过无数关心小方、向他打听小方消息的人。“我相信他不会有问题，因为他的机智，足以应付非常事变，他的才能也应该为中国新闻事业，中国民族解放事业，多尽些力量。”他这样想，也这样答复他人。

然而，一年又一年过去，小方始终不曾出现。

北京东城区协和胡同10号，是方大曾曾经的家，1937年7月，他最后一次从这里走出。

方大曾失踪后，母亲朱理至死不肯搬家，因为儿子离家前，她曾跟他约定：我反正就住在这，你什么时候回来就到协和胡同来找我。

方大曾的外甥张在璇记得，小时候他问外婆，别人都搬新家了，咱们怎么不搬？“外婆说我不搬，我要等着我的儿子，等你大舅，因为我跟他约定了，他以后是要回来找我的。”

她就这样在老宅等了32年，直到1969年去世。

方大曾的妹妹方澄敏悉心保存和整理了哥哥留在家里的底片。它们被套在粉色纸袋中，整齐码放在一个棕褐色木盒里，历经战火和种种动荡磨难，跟随方澄敏从少女时代走到白发苍苍，又在她过世前，被托付给家族的下一代。

2006年3月16日，方家三代人精心保管近70年的837张方大曾摄影作品底片，由其家人无偿捐赠给中国国家博物馆。这些珍贵的影像史料终于找到归宿，成为全社会共有的财富，而那个早已离开、并一度被大众遗忘了60余年的背影，那个英俊、高大、不畏艰险，奔走于战场上的年轻人，也在人们的怀念、发现与追寻中，重新转身，向今日的我们走来。

2000年7月，纪录片《寻找方大曾》在央视播出。纪录片导演冯雪松从1999年发现方大曾后，开始了对其生平持续至今的寻找，先后出版了《方大曾：消失与重现》《方大曾：遗落与重拾》等专著。

2015年7月7日，“方大曾纪念室”在保定落成。

2018年7月7日，“方大曾研究中心”在保定成立。

2021年，献礼剧《理想照耀中国》在《我是小方》单元中，讲述了方大曾的故事……

参考资料：

《解读方大曾：方大曾作品及范长江新闻奖得主的阅读笔记》，冯雪松主编

《方大曾：消失与重现》《方大曾：遗落与重拾》，冯雪松著

《战地萍踪》，陆诒著

从亲历屈辱到尽享安宁

听“七七事变”亲历者讲抗战

新华社记者邰思聪、吴文诩

永定河畔，卢沟晓月。数百年岁月静好的“燕京八景”之一，84年前却成为见证中华民族屈辱历史的铁证。

头顶遮阳帽，漫步卢沟桥，触摸石狮子，作为“七七事变”的亲历者，90岁的“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获得者、“时代楷模”荣誉获得者郑福来老人，为了让后人铭记那段刻骨铭心的历史，仍坚持在炎炎夏日中，向来往的游客介绍他眼中的抗战故事。

84年前，“七七事变”爆发，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我土生土长在卢沟桥，一辈子就生活在这儿。‘七七事变’的时候我6岁，那时惨烈的景象我到现在还记忆犹新。”郑福来站在桥中央远眺着宛平城门回忆道，那个晚上，他在密集的枪炮声中惊醒。“我家就住在卢沟桥西，离那儿不足50米。那天晚上，震耳欲聋的炮弹声差不多响了一宿。头一天还跟我一起玩儿的小伙伴，当晚就被落在家门前的炮弹给炸死了！”

说着过去的经历，老人声音有些哽咽。“当时驻守在卢沟桥附近宛平城的是国民革命军第29军，那晚过后，很多战士都牺牲了。”郑福来说，就在自己平时常去玩耍的一小片松树林里，摆放了很多战士的遗体。尽管那时候他还小，但不屈的抗战精神早已深深烙在他的脑海里。“吴家的二叔、任大嘴，还有很多其他乡亲被侵略者残忍杀害了，卢沟桥和宛平城门上的弹痕就是见证。”

7月5日，郑福来在卢沟桥为游客讲述抗战史。新华社记者张晨霖摄

受到抗日战士们英勇气概的强烈感染，郑福来在心中埋下了革命的种子。他18岁参加革命工作，不久后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还以卢沟桥镇政府民政委员的身份前往天安门广场参加开国大典。从此，他的全部青春完全凝结在首都的建设中。1952年当选为卢沟桥镇第一任镇长，同年接待美国记者爱泼斯坦，1959年带着群众为首都十大建筑供应砂石料……在很多重大历史的进程中，都有他的身影。

在基层岗位退休后，郑福来并没有闲下来。作为卢沟桥抗战的“活历史”，他成为抗战史的“义务讲解员”，为来往游客介绍着桥上碑文和亲身经历。因年事已高，郑福来需要扶着栏杆站立讲解，但他不惧风吹日晒，每每讲到动情处，往往情不自禁用力拍打栏杆，只为让更多人知晓那段历史。“曾经遇到过一些日本游客不认同我的讲解，但卢沟桥这座桥本身就是历史的见证，这是谁也无法抹去的历史证据，足以反驳那些不认同这段历史的人。”

84年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幸福、社会安定，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在观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后，郑福来在当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我是卢沟桥人，不能让过去国家的屈辱史被遗忘，历史就是我们的根，我们要做有根有魂的中国人。党经过百年奋斗历程，带领人民从民族独立、民族解放到今天的盛世，作为老党员，希望年轻人将伟大的抗战精神继承下去，奋进新征程。”

卢沟桥上，从甘肃来京旅游的王鹏带着孩子听完郑福来老人的讲述后说：“作为一个中国人，绝对不能忘记卢沟桥事变。这个暑假，我特意带着上小学的孩子来亲眼看看这座桥。”王鹏说，要让孩子们从小就明白一个道理：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为了民族独立和老百姓的安宁，无数革命先辈浴血奋战，他们是我们心中的英雄。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战士们抛头颅、洒热血换来的美好生活，更应该珍惜，只有了解历史，才能建设好国家。”看着卢沟桥畔的晓月湖和宛平湖，有着69年党龄的郑福来眼神坚定。他说：“只要我走得动、说得动，就会一直说下去。未来的路还很长，我将一直奋斗下去。”　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

新华时评

和平与发展事业必胜

84年前的7月7日，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民族存亡之际，全体中华儿女奋起反抗，8年浴血奋战，迎来了近代以来中国抗击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如今，在我们大步迈向民族复兴之时，更应当铭记这段历史，从中汲取力量，在新时代续写和平发展篇章。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84载春秋易逝，战争留下的记忆和教训却从未远去。如今宛平城的城墙，仍保留着当年的弹坑。累累伤痕传唱着无数先烈英勇杀敌的慷慨之歌，向世人痛陈着“落后就要挨打”的惨痛教训。

硝烟已散，精神永存。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团结一心、自强不息，以矢志不渝的信念、艰苦卓绝的奋斗，推动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所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华民族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中国从战争的苦难中走来，更能体会和平的来之不易。爱好和平是融于中国人民血脉的基因。中国人民自古以来就乐于与世界和平相处、共谋发展。如今，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中，我们坚持对话协商、坚持共建共享、坚持合作共赢、坚持交流互鉴……为世界和平发展与合作贡献中国方案。不管世界风云如何变幻，中国人民将始终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一道，捍卫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绝不让历史的悲剧再次上演。

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回望历史，感慨万千。中国人民爱好和平，中国人民不畏强暴。任何欺负、压迫、奴役我们的痴心妄想必将失败，任何阻碍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诡计伎俩也必将失败。世界潮流滚滚向前，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必将胜利！

（记者田晨旭）

新华社北京7月6日电

本报地址：北京宣武门西大街57号　邮政编码100803　中国邮政发行投递服务电话11185　广告部电话63071265　广告许可证：京西工商广登字20170529号　定价：每份0.9元　年价324元　本报挑错电话：010-63073979、63072070　本报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市富通律师事务所　电话：010-88406617、13901102545